

#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美、日、中的发展

## ——对沃格尔教授谈话的理解和补充

### CHINESE'S REFLECTIONS ON JAPAN'S EXPERIENCE

丁学良

沃格尔教授作为一个西方的社会学者,对日本的发展作了长期、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尊重。我作为他的学生和助手,不论从工作上或个人关系上都和他交往甚密,对他的思想和著述比较了解。这次遵从沃格尔教授之嘱,就他的谈话,谈谈我的理解和补充。

在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兴起之前,对于现代化道路的看法,西方学者中存在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自大倾向,因为当时真正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只有西方模式。当日本和四小龙以比西方更有效的方式、更快的速度咄咄逼人地兴起之后,西方学者开始改变观念。通过长期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了日本和东亚成功的某些重要因素及西方一些固有的弊端,从而得出一些极有价值的结论。沃格尔教授就是这方面著名学者之一。他以一位西方学者的身份,对《科技导报》谈了关于美、日、中发展的比较。我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热潮中,带着中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到国外学习、研究“比较现代化”课题的,因此,我想从中国人的角度,联系中国的国情和背景,谈谈我的理解和看法。

我完全赞同沃格尔关于“组织起来”、“官民协同”在后起现代化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观点。早期发展的西方国家,是靠私人企业家的个人奋斗、探索,历经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而战后的日本和东亚诸小龙,则是靠有效的组织,靠稳定的雇佣关系、劳资关系,以走近路、走快路的办法,高速兴起的,政府是其中最有效的指导者。这些

国家和地区的这一经验值得我们重视。这也许使人感到困惑,因为我们的政府也一直对经济活动实施领导和干预。但这只是表面上的雷同,而实质上的差别是很大的。下面分三方面谈谈这些差别。

当前世界上有三种典型的经济模式,即美国式、日本式和苏联式。美国式是高度自由的经济,苏联式是完全集中控制的,这是两个极端。日本则西取自由经济的优点于企业,东取集中指导、有效组织的优点于政府,从而取得了远胜于东、西方的成功。西方学者认为,日本采取的有效组织、官民协同、长期雇佣、劳资协调等方针值得学习,因为它可以治疗西方社会存在的企业各自闯荡,在弱肉强食中自生自灭,工人罢工—工资频涨—企业利润下降—企业萎缩倒闭,或企业科研、发展资金下降等顽症。这些顽症,最终导致国际竞争力的下降。我们中国的经济原本是苏联模式、经济普遍缺乏活力。而日本成功的首要基础,恰恰就是企业的自主性加政府的有效指导形成的巨大经济活力。他们一方面有计划地避免西方经济过分自由化的弊病,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避免高度集中造成的僵化,因而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后来居上。我国作为一个后起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真正欲求更快的发展速度,必须创造三个条件:

1. 允许企业、企业家和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有充分的自主权,这必然要涉及所有制的形式及市场机制问题。
2. 必须从工作能力(智能、技能)、伦理道德、

丁学良 (Ding Xueliang) 中国社会科学院赴美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沃格尔教授的研究助手。

献身精神诸方面根本解决干部素质问题,这势必涉及整个干部体制的根本改革问题。

3. 真正重视教育,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这首先要匡正对教育本身的基本认识,解决许多基本观念形态问题。

下面分述我对这三个问题的看法。

## 经济活动中的充分自主权 与所有制形式问题

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任何社会的经济原动力和活力皆来自企业、企业家和个人的积极性。没有下面的这种自主性基础上的活力,再好的政府指导和组织都没有意义。西方,包括日本,他们的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来源于私有制,来源于个人与企业间直接的利害关系。在中国,企业与个人的积极性因吃“大锅饭”而长期受到很大抑制;而一旦向企业放权,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厂长与工人大分“奖金”,“吃”国家,“吃”企业的现象。这是中国搞活企业面临的问题。在公有制的条件下,如何把现行体制改造成能激发活力的体制呢?我认为中小企业、商业的承包、租赁确是一条可行的出路,而股份制(包括大企业的股份化)、债券化则是公有制的另一条重要出路。在此,首先要搞清两个区别:国有制与公有制的区别,股份制与私有制的区别。国有制与公有制并不是全等关系,国有制仅是公有制的一种,而且中外历史证明,它并不是一种好的、有效的公有制。股份制也并非就是私有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股份制可以成为使劳动者既享有权利,又具有不竭动力的公有制形式之一。比如上海宝钢,假如10万职工,每人都购买1 000元宝钢股票,这1亿元虽然仅占宝钢总资产的1%(或尚不到),但这样一来却可密切职工与本企业的经济血缘关系,使职工全面关心本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职工将通过自己的股份代表,更平等、更直接地介入企业的经营、发展决策;另一方面,工人自己也会起来制止吃企业、挖企业的倾向。随着职工股份的增长,这种实际的主人作用将越发增强。中国应坚定不移地走承包、租赁以及股份化、债券化这种既非国有制、又非私有制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从低效益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又不会走向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极端。同时,股份化、债券化也可把我国当前的“超前消费”倾向引导到“滞后消费”的正确方向。日本,东亚诸小龙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扬东亚民族传统的勤俭风尚,从人民群众的“滞后消费”中吸收、积累大量民间游资,从而渡过发

展初期资金奇缺的困难阶段。

实现企业及公民在经济活动中的充分自主权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经济必须通过市场机制运行。日本就是在有效的市场机制基础上,配合政府有计划、有目标的引导,才获得成功的。西方经济(包括日本)成功的奥秘,在于它的市场刺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技的创新又通过市场马上转变成经济效益,形成技术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实际上,在经济活动中,各种各样的可能发展、潜在机会,都要通过市场才能得到尝试、验证。市场就象战场,一切技术、商品、服务通过市场得到检验筛选,犹如各式武器在战场上相互较量,优胜劣汰。一切社会需求,一切科技和生产方面的新奇构想、创造,都会在市场找到它们之间的结合点。因此以商品经济、市场机制作为我国整个经济运行的方针,实是国家民族振兴的基础。

## 干部的素质与选择机制问题

沃格尔在谈话中,谈到日本的干部素质和在公众中的声誉问题。为什么干部的素质与干部的选择在日本以及所有后起现代化的国家中要比在西方显得更重要,更具有决定性作用呢?道理很简单,西方的早期发展,是靠千千万万企业家自己探索,自由发展,政府的指导、领导作用很小。政府官员的素质对企业、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不大。日本则是由政府指导企业的发展方向。一旦政府判断、决策失误,势必贻害全局。因此,官员的洞察、分析、决断能力将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日本靠专家文官制(Bureaucracy)来确保政府官员素质,并保持其任职的稳定性。除总理(首相)、各正部长(省长官)以外,从各部副部长(次官)以下,都实行文官制,实际上是技术专家、技术官僚制。政府从最好大学的最好学生里对口选择年轻的低级文官。例如,将最具权威的东京大学每届毕业生的前十名或前五名全部选入政府,开始长期的培养、训练、考察,并根据随后表现出的工作能力、工作精神、伦理道德逐步升迁,基本是终身任职。其中最优秀者,将成为各省(部)的次官。这样就在政府(特别是在经济、技术、企业领导要害部门)中形成了一个精干的,非常有效的,由管理方面最佳人才组成的“领航员”队伍。这些专家型的技术文官,因长期稳定任职,对国内外、行业内外有关本部门的情况、信息、发展以至各种潜在的机会和可能的危险都了如指掌,而且有长远的战略眼光。由于各省(部)之间的官员都是多年同学、同事,个人关系十分密切,部门间、行业间的“恳谈”、协同、协调十分自然通畅,避免了

许多官样程序和扯皮推诿,这都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对当权者之间可能出现的互相勾结、营私舞弊现象,主要靠独立的新闻媒介的公开监督。一般说,这种监督在防止官员腐化上是十分有效的。官员的腐化,一旦被揭露,则身败名裂,绳之以法。拥有偌大权势的田中首相,贿陋败露,也只得下台受审。

## 真正重视教育、重视知识、 重视知识分子是现代化的基础

日本的成功,其一大要素就是长期来把教育视为立国之本,已形成传统。战后的日本教育把东方教育和西方教育的长处结合在一起。在伦理道德教育方面,变战前单一的诗经、论语的孔教灌输为“世界各国伦理原则”的介绍,供学生自己去了解、比较,由学生自己去体验、判断、选择或择优结合。现代知识的掌握和探索则作为教育的主体内容。其结果,日本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更强了,由此建立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才基础。

一位美国学者罗伦(T.Rohlen)根据他在日本一所中等水平的普通中学长期蹲点的考察研究认为,日本中小学的基础教育从四个方面促进了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

1. 注意从小培养、引导学生在各种组织中与别人齐心协力、共同合作的精神。

2. 注意培养很强的“信息意识”,启发对各种信息的兴趣,培养收集、组织、运用这些信息的能力。在伦理方面,采取世界化、开放化的教育方式,不搞灌输,不搞强迫接受,而是由学生自己去理解、领悟、判断、选择。这样,每人对伦理道德的遵守才有真正的自觉性。

3. 注意从小培养很好的个人行为,包括遵守公共秩序,礼貌、干净、整洁的习惯。实践证明,这些素质明显地反映到现今日本社会中普遍的工作

纪律、社会公德和社会风尚方面。

4. 高度重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协调、配合,使青少年的成长一直处于稳定、可靠的关怀中,从而避免了西方社会在中学阶段存在的家庭放任,学校无力,从而使各种不良行为、不良意识和各种弊端丛生的现象。

实际上,上述前三条恰恰体现了一个现代工业社会的普通成员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正是一个现代化社会所必需的社会基础。

联系到中国的现状,我认为,在教育观念和教育资金、人力的投入上,以及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物质待遇上,还远远谈不上真正重视教育,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若不及早大大改善教育状况,中国的发展必将受挫于此。

这里想就教育观念的问题谈点看法。教育的出发点在于培养人才。所谓人才,我想,除了应有的扎实的学识和技能基础、极大的工作热情、执着的献身精神外,优秀人才的最宝贵的素质就是既能脚踏实地地体察实情,又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创新,勇于超越前人,开创新境。但长期来,某些领导人,喜欢“听话的人”,把有独立见解者视为异端。这种倾向始于“反右”,在十年动乱中达到顶点。我认为我们的教育方针必须着眼于培养勇于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人才。

对教育投资性质的认识也是一个关键问题。要改变那种不承认教育是生产性投资,只认为是文化性投资,舍不得花大钱的作法。教育投资是国家社会发展的根本性生产投资,是现代化最重要的基础投资。这一环失着,就会环环失着。现在的轻视,就会给十年、二十年后的发展造成根本的隐患。认识到这一点,教育的地位、教师的地位(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地位)、知识分子的地位等种种症结性问题,包括教育投资、知识分子工资的倒置,倒挂等实际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